

《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背景探析

臧 军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要] 吴越国钱镠奠定了“苏杭熟、天下足”江南富庶的“天下粮仓”，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和宋室定都杭州促进了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宋初年剧增人口带来社会压力急需农业技术推广载体的创新，京畿郊县於潜天然优越的环境成为水稻蚕桑生产和耕织文化的沃土，“诗画县令”楼璩情系耕织积极担当记录於潜农桑生产的画家，等等。这些得天独厚、适逢其时、正逢其人的历史背景所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条件，构成了《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 耕织图；诞生；背景

“中国古代农业耕织图像资料源远流长。在摄影术尚未出世的古代，聪明的古人采取绘制图像的形式是唯一可行的留真手段”，中国古代耕织图像“起始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反映原始农业的岩画，其后在先秦器物、两汉画像砖石、魏晋墓室壁画、唐宋石窟壁画”都有大量展示农耕和蚕织的图。^[1]但这些丰富多姿的耕织图像，都仅是某个生产场景或环节的表现，还没有系列化、完整性地展示农耕生产全过程。

南宋於潜县令楼璩绘制的《耕织图》45幅（其中耕 21 幅、织 24 幅），每幅图配五言诗一首，为历代农桑图像集大成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完整地记录了农耕蚕桑生产过程和生活状态，第一次以图文并茂的艺术形式描绘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桑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被誉为“世界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2]。该图问世后，由于“图绘以尽其状，诗歌以尽其情，一时朝野传诵几遍”^[3]，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海外，形成了耕织文化现象。已知有 50 多种版本流传（国内 30 多种、国外 20 多种），

对中国和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农桑技术、农耕文化、美术风格等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4]，成为农耕文化传承杰出代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甚至，有学者认为“每一个学科都可以在《耕织图》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5]。

通过对《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背景研究，发现《耕织图》在於潜诞生，有历史偶然，更有历史必然。唐末临安（於潜邻县）人钱镠在杭州创建吴越国，坚守“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6]的生存发展理念，从此缔造了富庶江南，使江南地区成为“天下粮仓”，开启了南粮北调的先河；北方三次人口大量南迁，带动经济中心南移，也给南方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生产力，北强南弱状态得到转换；宋室定都杭州，完成了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最后进程，使江南地区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日益彰显；南宋初年数倍人口激增带来重大社会压力，加上战争和朝贡北方的物资之需，迫使南宋政权加大劝农力度、严格劝农制

度,实施“稻麦二熟制”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由此倒逼农耕技术推广,急需创新科普载体的问世;南宋京畿郊县於潜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湿润、四季分明,交通便利、水运畅通,农耕兴旺、丝绸发达,商业兴盛、文化繁荣,是京城临安物资供应的重要保障地,是文人名家描绘山水田园耕织诗画的沃土;南宋初年於潜县令正好是一位诗画高手,且情系耕织,在任期间倾心农桑生产采风和艺术创作,积极担当了当地农耕蚕桑生产“留真”记录、艺术表达、图像传世的画家的角色。

上述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条件,促成了於潜从南宋 1300 多个县中脱颖而出,成为《耕织图》的诞生地。

一、“天时”优势——历史奠定坚实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南宋正处于中国历史发展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这一重要的转折机遇,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用近百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创新思维和创新举措创造的历史奇迹,为整个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格局的重大改变,埋下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石。南方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地位与作用开始凸起与显现,这样的历史时代,迫切须要先进生产技术普及推广和不断提高,迫切须要全社会格外重视农业生产,整个社会劝农、重农、兴农氛围浓厚,这为於潜成为耕织生产生活的沃土创造了天然优势,也为《耕织图》在於潜的诞生奠定了历史基础。

(一) 吴越国创建了富庶的江南

吴越国的缔造者钱镠(852—932),出生于临安县石镜山下。钱镠身处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国土四分五裂,强藩群起争霸,天下战乱纷繁,社会瞬息动荡,百姓民不聊

生。时世却造就了英雄:出身寒门的钱镠,从一个挑盐脚夫蜕变成“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7]的江南雄藩,并在东南地区建立了自己势力范围——吴越国,封号吴越国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定都杭州,历经三世五王存续 72 年(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立国时间最长)。钱氏家族的历代吴越国王,坚守“保境安民、发展农桑、善事中国”治国方略,使江南在战乱纷繁的时代,寻得了和平稳定、民生安宁的物理空间,抓住了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时机,快速富庶与强大起来,杭州也作为大都市脱颖而出,由此改变了北盛南弱格局,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谱写了厚重前奏曲。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钱镠和吴越政府最关键性的贡献就是使江南变成了“天堂”,从此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8]

公元 907 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钱镠被受封为吴越王。钱镠属下认为朱温是篡国之贼,不能接受封赏,应该兴军北伐。钱镠觉得“吾若外讨,彼必乘虚滋扰,百姓必遭荼毒,吾以有图有民为主”^[9],因此,钱镠坚持对朱温顺从,以称臣示弱换取和平安定。遵循这一基本思路,吴越国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为正朔,而一直朝贡中原,并且接受其封册。钱镠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主张,始终贯穿于吴越国的建国和治国实践,换来了吴越国近百年安定。

唐代,杭州大运河开通、城市规模扩建、人口快速增长,到了吴越国时期,杭州商业繁荣,已成为江南大郡。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吴越王钱镠建都杭州。当年,吴越王年仅 41 岁,年富力强,率兵士和民夫 20 多万人大规模扩建杭州城。新建的罗城将隋唐所建旧城包裹,规模浩大。吴越国定都杭州后,钱镠进一步扩建杭州城。梁开平四年(910),再次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罗

城又扩展了 30 里，内有子城，外有夹城和罗城，共三重，规模宏伟，十分壮丽^[10]。通过几次扩建和治理，钱镠将过去泛滥成灾之地，变成了华丽建筑群落，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商客，一时“钱塘富庶，盛于东南”^[11]，杭州已经成为王宫宏大、建筑雄伟和富甲一方、繁华美丽的城市。

钱镠在位 40 年，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奖励蚕桑。为防治海潮之患，从六和塔到艮山门修筑了工程浩大的钱塘江石堤，根治了钱塘江水患，人称“钱氏捍海塘”，至今还在守护着杭州。为提高农业产量，加大农田灌溉水利的整治，建立“都水营田司”作为统一规划水利事业的专门机构，同时由士兵组成“撩浅军”近万人，负责西湖、太湖的修整与疏浚工作。由于吴越地区地势较为低洼，水乡田面较低，为获得粮食丰收，吴越农民在河渠两岸的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称之为“圩田”，这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浙江丝织唐代就非常发达，吴越时期丝织业得到迅猛发展。当时官府集中了全国大批能工巧匠进行丝织生产，西府（杭州）就有锦工 300 余人^[12]，规模较大，产品丰富，是杭州历史上官营织造的开端。钱镠进献后唐朝时，就有大量的越绫、吴绫等丝织品。到钱俶时，丝织业更加发达，有一次进贡就有“贡锦绮 28 万匹，色绢 79.7 万匹”，太平兴国三年（978）又贡宋绢十万匹、绫两万匹、锦十万屯（六两为一屯）。^[13]吴越国出现了“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14]的赞誉。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钱俶毅然入宋京开封完成了钱镠“不事干戈、纳土归宋”的遗愿：主动取消自己的王位，将所部 13 州 1 郡、86 县、550680 户、115036 士卒，悉数献给宋朝。^[15]由此，“吴越国”番号消失，但吴越这块江南富庶之地保住了

没有战火的安定环境，生产力免遭破坏，人民也免遭涂炭，巩固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在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只有吴越钱氏是和平解决的，不烦干戈，泽被后世。苏轼评价说：“其民（指吴越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为了表彰钱氏家族对统一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宋朝在编《百家姓》时，特意将钱姓放在第二位。

（二）北民南迁促进江南的繁荣

人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农业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集聚，人口大量集聚经济才会有繁荣的机会。古代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中原大地，但随着北方不断的自然灾害、战争灾难、政权动乱等因素给人口生存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迫使大量人口离开故土，寻找新的居住地；南方的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钱塘江流域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季节分明、阳光充足，山多林茂、人口稀少，政权稳定、社会安宁，更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正是北方人口迁入的首选之处。于是，就有了中国历史上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三次引发的人口南迁，这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改写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

从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比重高于南方，但经历三次人口南迁，南方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并超过北方。如西晋“永嘉之乱”300 多年后的唐朝初年，南方人口占 54.6%，北方占 45.4%，南方人口首次超过北方。唐“安史之乱”200 年后的北宋初年，南方人口占 60.4%，北方占 39.6%。北宋“靖康之乱”36 年后的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方人口占全国 64%。^[16]三次历史之乱，北方人口洪水般跨过长江，导致中国人口中心南移。如南宋仅

在“绍兴和议”签订以前的十余年中，就有500多万北方人口迁入并定居南方。^[17]

中国第一个经济重心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中原地区。经济重心是相对稳定的，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政治、国防形势的演变，也必然寻找更适合的发展区域。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大致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历程，最终在东南地区聚合成一个新的经济重心，并取代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重心的地位。推动经济重心南移的幕后推手，就是历史上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尤其是北宋末年的北人大批南渡，彻底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一步。此后，南盛北衰的格局便再也没有改变。唐代北方移民携带的复栽技术使江南地区土地利用率先从50%上升到100%，宋代北方移民发展了稻麦轮作制，将江南农作物种植制度从原来的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进而将土地利用率先提高了一倍。^[18]宋代的最大垦田面积大约是7.2亿亩，这一数额不仅前代未曾达到，即使后来元明两代也未能超过。^[19]

南宋迁都杭州后，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中心移至江南。特别是重用南方士大夫日益明显，一段时间南方人在朝廷中的地位超过了北方人。南宋在高宗朝有籍贯可考的80名宰相和重臣中，北方移民34人占42.5%，南方人占57.5%。自高宗后，北方移民及其后裔重用的比例明显下降：孝宗朝北方人为25.5%，光宗朝15.5%，理宗朝为5%，度宗朝则无一人。在路一级的官员中，南方人也占据优势，史有记载的安抚使702人，除去籍贯不明的176人，移民及其后裔158人占30%，而南方人368人占70%。^[20]这些政治格局的改变，充分证明南方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地位与分量日渐凸显。

北人南渡是为了躲避战乱和异族掠夺而被迫离开中原的，有汉族人，也有女真、契

丹、吐蕃等少数民族，所以在向南迁徙的群体中不仅有平民，还有众多的富商大贾、文人墨客、宦官大族、皇亲国戚，以及能工巧匠、手工艺者等等无所不包。这些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群体，很多都是某个方面的行家里手，有些还身怀绝技。一时间，在南宋京都杭州自然形成了全国的人才汇集之地，带来了崭新的人文气息，促进了南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北方的语言发音、民情风俗、文学艺术、生活习惯、审美情趣、地道美食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悄无声息地影响和改变着南方。宋史学家林正秋指出：南宋京城临安（杭州）从事文化、教育、戏剧、艺术等的专业居民人数接近占临安城内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州郡数倍到十倍。^[21]

（三）宋代劝农举措强劲的推进

两宋时期，劝农制度较前朝更为完善。“劝农诏”“劝农使”“劝农文”等组合拳形成的系列劝农务实举措，就像一个“导航”系统，指挥和引导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地方官员落实朝廷部署，一时兴起了农桑生产和农桑技术推广宣传热潮。在这股热潮推动下，各地主要官员，纷纷撰写劝农文，创作劝农诗。南宋於潜县令楼璩也身在其中。

数千年来，春季发布“劝农诏”已经成为历代帝王每年的“规定动作”。到了宋代，“劝农诏”制度更趋完备和规范。每年春季，皇帝都亲颁劝农诏令，号召全国大兴农业生产。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朝廷多次颁发重视发展与保护农耕蚕桑生产的诏书，要求地方各级政府“永念农桑之业，是为衣食之源，宜行劝诱，广务耕耘”“增种桑柘，毋加赋税”，地方官吏以劝农种桑多少为赏罚标准，“民伐桑为薪者罪之，剥桑3工以上，为首者处死，从者流放充军。”^[22]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曾颁布《置农师诏》，

目的是在乡间推举经验丰富的农师来指导当地农事生产，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调动了基层劝农的积极性。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诏令县令以“十二事”劝农，要守土负责，作风务实，躬行阡陌，勤勉督查。

宋朝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与丝绸生产，除中央、地方常设的司农机构外，还在各路设立了劝农使、劝农副使的专门职位，并明确“劝农使”的职责就是劝农——劝勉、引导、督促、落实当地的农业生产。宋太宗时就有“劝农使”，将劝农作为固定职位计入官衔体系则是宋真宗时期。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权三司使丁谓提议设立劝农使，并由各州长官、转运使等兼劝农使，自此“劝农使”成为正式官职，纳入宋代王朝的官宦管理体系，州、郡、县各级长官以“岁时劝课农桑”为基本考课内容。地方官员以“劝农使”入衔后，还明确了“劝农使”必须完成的两项职责：一是每春二月农作初兴之时，守令出郊劝农；二是二月出县衙劝农之时，还须作“劝农文”一首，以宣告君王“德意”。^[23]这也是作为县令，楼璩必须完成的任务。

为了挖掘农桑生产的最大潜力，宋代又创新出台“劝农文”，并规定：作为各地各级地方官员，除了其他劝农事务外，每年劝农时还须作“劝农文”，这是一项硬性规定，也是地方官的“必修课”。“劝农文”为地方官吏撰写，主要目的是面向基层乡村百姓劝农，内容侧重于农事生产，一般在仲春时节颁布，发布劝农文成为地方官员劝诫农事的常见方式。“劝农文”撰写为三个部分：首先表达地方长官对农业的重视，针对当地农业情况的分析；其次是劝农的内容，包括传播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当地的社会风气等；最后表达对农事的期望。^[24]

唐宋时期诗画表现农村生活、农业生产的优秀作品蜂拥而出，涌现了韩滉的《五牛

图》、苏汉臣的《货郎图》、毛文昌的《村童入学图》、李嵩的《服田图》等。唐代画家韩滉（723—787）被宋高宗朝内府收藏的36幅绘画作品中，就有《田家风俗图》《尧民击壤图》《集社斗牛图》等13幅，都是以诗配图的“田家风俗画”^[25]。从当时看，诗画一致描摹乡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似乎成为一种时尚，明显地影响到了南宋时期的诗画风格。这一时期还兴起了文人雅士书写乡村生活的“农耕诗”，如林逋《葑田》、梅尧臣《和孙端叟蚕具诗》15首、王安石《和圣俞农具诗》15首，苏轼农耕诗200多首，涉及农耕、蚕桑、丝绸、果林等，对当时“农耕诗”风格具有较大影响。^[26]北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曾在皇宫延春阁两壁画有耕织图，到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0），改为山水画。^[27]可惜此图早佚。但这可能是楼璩系列化《耕织图》诞生的前奏——楼璩绘制《耕织图》受其影响较为直接深刻。

二、“地利”优势——区域环境得天独厚

从地理位置来看，於潜拥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天然的农桑生产条件、悠久的历史、社会文化历史、畅通的天目溪水上交通。南宋定都杭州后，於潜是京都的畿县，天目溪两岸的水稻粮仓、桑园蚕家、众多窑厂所生产的粮食、丝绸、瓷器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杭州，於潜便成为京城物资的保障地和朝廷赋税的供给地。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为《耕织图》在於潜的诞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地利”条件。

於潜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秦朝即置於潜县，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於潜县属丹阳郡，南宋时为京城临安（杭州）畿县。於潜县建制持续沿革2000多年，直至20世纪根据国家统一规划

才有所调整：1958年撤县并入昌化县，1960年随昌化县并入临安县，1961年调整为於潜区（下辖於潜、藻溪2镇和横塘、对石、绍鲁、西天目、凌口、千洪、横路、太阳、方元、景村、堰口、塔山、紫水、马山、乐平15个乡），与玲珑区、昌化区、昌北区共同构成四个区同属临安县；2001年、2008年、2011年先后三次调整行政区划，撤乡扩镇，原於潜区所属17个乡镇重新组合为4个镇（於潜、天目山、太阳、潜川）。原於潜县地理范围2000多年来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虽然现在分设为4个镇，但习惯上人们仍然将这4个镇统称为“於潜地区”。

（一）天然的农耕蚕桑环境

於潜地处北纬 $30^{\circ}15'$ ，东经 $119^{\circ}23'$ 。地理环境可用“一山一水、横竖交错”来概括。“一山”即天目山，“一水”即天目溪。天目山脉在於潜北都从西北走向东南，横亘於潜北部大部分地区，天目山主峰海拔1506米，其余大部分山地为海拔600—1000米，森林茂密、大树华盖、植物繁多、云雾缭绕。於潜地处天目山脉以南、天目溪两岸地区，峰峦起伏绵延、溪沟纵横交错，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於潜的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四季分明，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最适合各种植物生长；於潜的土地，既有缓坡丘陵，又有平整水田，沟渠水网相连，泥土滋润肥沃，是“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的地方。

天目溪源自天目山海拔1506米的桐坑岗，自东关溪发源，由北向南纵贯於潜全境，沿途吸纳汇聚虞溪、丰陵溪、藻溪、交溪、富溪、浪溪、昔溪等7条支流，在马山与昌化溪汇合后，出於潜东南汇入分水江进桐庐境内后流入富春江，全长50多公里，流域面积790平方公里。^[28]天目溪一路走来，滋润肥沃了沿途两岸的大片土地。根据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版《临安县志·

土壤图》，可见紧贴着天目溪自北而南，在天目溪两岸紧紧分布着一批水稻土壤，特别是到了天目溪中下游的横塘、藻溪、对石、於潜、堰口、紫水、马山、乐平一带，水稻土的分布越来越广阔，占於潜全部土地面积的10%左右，这些地区的水稻土宜于种植水稻，自古以来是种植水稻的良田。^[29]天目溪两岸水稻土的周边地区，广泛分布着红壤，占於潜全部土地面积的60%左右，天目溪两岸低丘缓坡上的黄壤，十分适合种植桑树，用来养蚕。清光绪二十四年《於潜县志》有“蚕桑之利，合境皆有之，南乡地暖，植尤盛，所出丝东乡为上”“民生大计，首重农桑，潜邑男务耕耘，女勤蚕织”“潜邑处杭之西偏地……地多种桑，葱蔚蔽森，机声轧轧”“月令季春劝蚕事，邑中户户养蚕足”等记载。可见，历史上於潜地区农耕蚕织的繁荣景象，被誉为丰收之地、丰国之乡、丰盈之村，成为南宋京城临安坚固的后方物资供应地。

“畈”指成片的田。於潜许多村庄就以“畈”命名，多密集分布在天目溪中下游两岸海拔50—150米的冲击平原，造就了江南地区天然的粮仓。南宋於潜县设置丰国、嘉德、惟新、波亭、潜川、长安等六个乡四十四里^[30]，其中丰国乡（意寓粮食丰收国税来源之乡）地处天目溪中下游的藻溪与天目溪交汇地带，在溪流两岸海拔100米以下的冲击平原密密麻麻、连绵不断地分布着一片又一片看不到尽头的田畈，至今还保留着不少与水稻种植有关的地名，如横畈里、百亩畈、九里畈、横塘畈、上畈、下畈、对石畈、田畈里、塘阴畈、大畈地和里田坞、盈村（源自粮食丰盈之意）；在天目溪中下游的嘉德乡、潜川乡沿天目溪两岸，还有龙头畈、杨村畈、夏家畈、田干畈、敖干畈、大畈、凤田畈、堰口畈、汪家畈、乐平畈和米筛坞、大麦桥等地名，这些田畈集群充分说

明了於潜地区水田资源丰富充沛，水稻种植田畈四处分布，稻麦两熟种植制度已推行。我们发现不仅光绪《於潜县志》有“秧田庄”地名，当下的电子地图上也有“秧田坞”地名，在天目溪中下游西岸原南宋波亭乡（今太阳镇更楼村内），并设有“秧田坞”门牌号码，约有 40 多家农户居住。“秧田坞”村庄仅从字面上理解，可能是主要从事秧苗培育的村庄，从这里将集中培育的秧苗提供给周边地区迅猛增加的水稻田畈种植。可见，南宋时期，於潜地区的水稻耕作已经有明确的专业分工。但目前还未找到更多的佐证资料，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南宋原丰国乡的范围内，至今还有“丰仁”“盈村”“米筛”的地名。这些在南宋就有的地名，似乎都与粮食丰收、稻米加工等有关联。如今的“盈村”附近，已经是连绵面积近万亩的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由临安区人民政府 2022 年建成，涉及天目山镇的桂芳桥、肇村、九里、对石等“田畈”连片的行政村，在平坦整齐的水稻田里，竖有“天目粮仓”巨牌。如今的“米筛村”，是一个大喇叭形状的山坳，坳口较大，朝里走深约三里地，现只有 4 户留守。与“米筛村”隔路相望的，是现代农业观光体验为主题的民俗，名字挺有意思，叫“皮园”。在天目溪下游原南宋於潜南部地区的潜川乡，至今还有南宋地名“桑干村”，这与清光绪《於潜县志》“蚕桑之利，合境皆有之，南乡地暖，植尤盛”记载吻合。

（二）优越的社会发展环境

根据在天目山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工具、陶片，可知早在 5000 多年前，於潜这块土地上就有我们的先民在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相传夏代少康之后封越，分支庶居住在於潜，至今在於潜阿顶山还有越王坪遗迹。

於潜是江南地区建县较早的地方。《吴

越春秋》记述“秦徙大越鸟语人置之暨”，因为与安吉、徽歙接壤，地属鄣郡。《汉书·地理志》说，汉武帝元丰二年（公元前 109 年），鄣郡更名为丹阳郡，属于扬州，管辖十七县，其中就有“於暨”。《后汉书·郡国志》开始加水写作“潜”（暨与潜音同）以后各种史籍都称“潜”（至于“於”字系吴越人发音，无实际意思）。於潜县名一直沿用。^[31]到 20 世纪 60 年代於潜县并入临安县后，随着国家行政区划的多次改革，原於潜县所辖地理范围调整为 4 个镇。

到了南宋，北方流民大量迁入於潜县，人口数量创造了历史高峰，激增人口给於潜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新红利，推动了农桑快速发展。南宋於潜县在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有人口 45292 人，南宋乾道五年（1169）人口 46292 人，南宋淳祐九年（1249）人口 112291 人。^[32]在 1016—1169 年的 153 年间，增加了 1000 人，年均增加 6.5 人，与其他相邻县基本一致；而在 1169—1249 年的 80 年间，突然增加 65999 人，年均增加 825 人，增加速度历史罕见。2021 年於潜地区为 4 个镇（於潜、天目山、太阳、潜川），人口 131879 人。^[33]在 1249—2021 年的 772 年间，人口增加 19588 人，年均增加 25.4 人。为什么南宋短短 80 年人口迅猛增加 6.5 万人，而以后 770 多年间才增加 1.95 万人？其实，这与南宋流民落户政策有关。为解决南迁北人基本生活，南宋鼓励和引导南迁北人到江南地区各州、县垦荒种田，凡垦荒所得田地可以归垦荒者所有，各地政府还为垦荒者提供农具和粮食种子，或完全免费或低价租借，田地所得粮食收入减免一定年份的赋税。这一时期大批南迁北人分流到各县，垦荒种地、自力更生，定居当地生活，被称为“流民”。这些“流民”虽在南宋初年就在南方生活，但在开始时不需要缴纳赋税，也不需要落户

人口登记,因此在南宋初期几乎很难找到准确具体的“流民”人数,而事实上当时的“流民”在各地实际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在册人口。於潜也不例外,虽然人口登记只有4万多人,但实际人口估计不会少于10万人。到南宋中期,中央政府开始对“流民”征税就必须落户登记,於潜人口一下子从4万窜升到11万,几乎是原来的三倍。

唐代,於潜丝织品已是外贸和贡赋之品,唐开元年间(713—741),於潜上贡的有绀绫、纹绫、白编绫,元和年间(806—820)上贡的有白编绫。^[34]五代,吴越国王钱镠采取“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的国策,劝民农桑,“善诱黎氓……八蚕桑拓”,采用各种方法劝导黎民百姓经营蚕桑丝织,一年之中蚕可八熟。^[35]不但农村“桑麻遍野”,城镇也是“春巷摘桑喧咤女”,於潜农桑事业获得较大发展。当时临安功臣山净土寺等地种植了大面积桑树。^[36]后梁贞明六年(915),钱镠衣锦还乡,盛宴父老,“山林皆覆以锦”,以示故乡蚕织繁荣,反映当时蚕织盛况的街道名称“绣衣坊”“衣锦坊”长期沿用。宋祥符年间(1008—1016),於潜有人口19984户、45292人,缴纳“夏税”丝381斤(古代一斤16两),“秋粮”苗米11241石(一石稻谷相当于今天100斤,即缴纳稻谷112万斤;一石稻米相当于今160斤,即缴纳稻米179万斤,人均纳粮40斤)、本色绢8240匹、547匹、绵5679两。^[37]根据这些上缴的稻米与丝绸产品,结合当时於潜全县人口,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发现宋代於潜一年每人缴纳了稻米赋税40斤、本色绢6米(一匹为33.33米长)。根据南宋《咸淳临安志·物产·丝之品》记载:“绵,土产以临安(临安县)、於潜白而丽密者为贵”。吴自牧《梦粱录·物产·丝之品》也记载:“绵以临安於潜白而细密者为佳”。明代郎瑛撰

写的史料笔记《七修类稿·苏小小考》记载,宋代钱塘(今杭州)名妓苏小小的阿姐盼奴一次向商人诱取百匹丝绢,就指明要“於潜官绢”。可见,当时於潜的蚕桑丝织业繁荣发达、声名远播。

於潜由于地处杭州城西部,又拥有道教和佛教圣地的天目山,距离吴越国王钱镠故乡临安30里左右、与杭州城距离80里路左右,为杭州属县,引来了历代的无数名家大师,唐宋时期就有不少杭州的地方官员和文人雅士到於潜考察和游历,留下了不少诗篇。武帝普通七年(526),梁昭明太子萧统就隐居於潜的天目山读书,编纂了《昭明文选》30卷。^[38]唐代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等到过於潜,对於潜的乡村和山水之美,称赞有加。苏轼在杭州任职时多次到於潜巡查和指导扑灭蝗虫,在於潜写下了《於潜女》等诗篇传世,还在《於潜绿筠轩》一诗中留下“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名句传世。^[39]

(三) 便利的水上交通枢纽

据南宋乾道《临安志·水路》记载:京城临安(杭州)可通水上航道六条,其中一条为:“西南自浙江八溪至白峰一百五十三里,入严州界”,就是钱塘江水路,这条水路西行到富春江即与分水江相融,稍再向西分水江即与天目溪相接。这就是天目溪通往钱塘江的水上航道,是联通於潜和杭州的水上航道和生命通道。

南宋杭州是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临安(今杭州)人口曾经达到150—160万人,此时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10万人口,作为世界著名的大都会伦敦、巴黎,直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人口也不过4万—6万人。”^[40]大量剧增人口需要京城周边地区提供大量的粮食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瓷器的日用市场和宫廷所需急剧增长,大量南下的制窑工匠进

入京城周边地区建立窑厂烧制瓷器。古代窑厂使用龙窑烧制，需要依据山形建造。为原料窑土取材方便和产品运输方便，窑厂一般都依山傍水而建。在离京城 80 多里地的天目山下的天目溪两岸就分布着东西两个区块的数十家窑厂，生产出来的大量民用瓷器产品，依靠天目溪的水上航道，及时被运往外地。这些在天目山下出品的各色瓷器，从於潜县北的后渚桥码头装船，顺着天目溪南下 50 多里，到乐平和印渚埠再转入分水江，之后进入富春江了。在富春江由西向东航行，不出一天就可以抵达京都临安，进入市场，销往全国各地和海外。

天目溪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运送粮食和丝绸产品以及於潜的山货贡品。至迟从唐代开始，每年的秋季，都要将於潜的稻米和农妇们织造的丝绸锦缎以及各种本地产的贡品，通过水上航道运往杭州府，再转运京城。到了南宋时期，临安（杭州）人口集聚增加，大米、绸缎、日用品等需求大增，於潜粮仓生产任务日益繁重，天目溪的运输任务也随之任务加重。朝廷规定上缴的皇粮和赋税及贡品运输到京都，都离不开天目溪这个重要的航道。

为确保天目溪水上航道运输的畅通无阻，历代朝廷都十分重视天目溪水上交通线路疏通维护、整修拓宽。唐贞元十八年（802）於潜县令杜咏倡导开紫溪水溉田，又开凿渠 30 里以通舟楫。南宋绍熙（1190—1194）、庆元间（1195—1200），於潜知县邵文炳兴修水利，于紫溪下游燕尾滩凿去钜利之石，使操舟者无险阻之患，并疏浚元丰塘，建乐平、清莲塘。自南宋以来，将此段两江交汇的广阔河滩地域，取名为“阔滩”，载入历代编修的《於潜县志》。“阔滩”地名，沿用至今。民国 28 年（1939）《於潜县经济概况》记述，自后渚桥至印渚埠长达 50 华里河道可通船筏。^[41]

三、“人和”优势——诗画县令情系耕织

从人对社会的作用来看，南宋初年於潜正好遇上了一位诗画技艺俱佳的县令楼璩。楼璩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有家族影响和社会人脉做强大的后盾，“宣和五年（1123）以父恩补将仕郎”^[42]，又在绍兴三年（1133）五月庚辰，在度支员外郎、权监察御史胡蒙的荐举下，楼璩任职於潜令^[43]。

由于楼璩从政有父亲以及父亲好友等指点，能够及时获得朝廷最新政策信息，了解与掌握皇帝当下最关注的问题，加上自己又具备绘画技能，便在朝廷高度重视、严格推进的劝农重农兴农政策感召下，同时深受当时诗画描摹现实农耕生活风尚的感染影响，情系农耕蚕织生产，潜心完成“劝农使”任务，并出色地发挥绘画技能，创造性地运用图文并茂的艺术表现手法，精心绘制了《耕织图》，既可直观形象地记录劝农成就，也可积累向上汇报的政绩，更可推广新的生产技术。于是，楼璩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代背景下，成为《耕织图》画卷的创作者。应该说，楼璩的到任，为《耕织图》在於潜的诞生提供了人才保障。

（一）县令楼璩来自显赫家族

从北宋开始，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倡导科举入仕，全国文教发达、各地书院林立，思想限制宽松、学术氛围活泼。在整个社会崇文重教大背景下，位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明州（今宁波），就应运而生地涌现了以史氏、楼氏、袁氏、丰氏“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一批士族家族。这“四大家族”在两宋时期，仅“史家”一门就出了 3 个宰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而“楼家”一门就出了 46 位进士^[44]，且大多进入

仕途担任地方重要官员，主掌一地之政务，有不少知县、知州（府），还有到中央政府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楼钥，为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收藏家，著有《攻媿集》等传世。

楼璩就来自宁波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四明楼氏”。楼璩是楼钥的伯父。楼钥《攻媿集》中，就有不少记载了伯父楼璩的文字。

楼氏家族的家学源远流长，富甲一方的先祖楼皓，构筑了“潜心儒学、熟读诗书，崇文重礼、修身治国”的家学家风雏形；学子满天下的教育名家、楼璩的太爷爷楼郁，总结提炼并创立了楼氏家族“崇文重教、读书应举、修身报国、文献传家”的家风；身为台州知州、楼璩的爷爷楼常，他将楼氏家风发扬光大，把“崇文重教、读书应举、修身报国”定格为家族子孙遵循的基本目标。自楼郁之后，四明人爱聚书藏书成为一种风尚，从达官显贵到一般人士，概莫能外，而且生生不息，延续不断，至今仍然有保存完好的天一阁、五桂楼等藏书楼，珍藏古文献和地方文献 40 多万册，这在我国藏书史上十分罕见。^[45]四明因此有了“浙东名城、文献之邦”美誉。

楼璩赖以生活的家族是著名的“四明四大家族”之一，不仅家族产业富甲一方，而且政治地位显赫一时。因为，楼璩生活的年代，不仅有太爷爷楼郁的光辉笼罩，还有父亲楼异的“荫庇”（楼异任明州知府，名重一方），可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楼璩从小受到全面良好的教育、严格的书画技能训练、顺利走上仕途等等，都得益于“楼氏家族”的“荫庇”。

（二）广交天下文友的书画家

受家学家风的深刻影响，四明楼氏子孙经过全面、系统、长期的“家族封闭式”“摇篮式”训练，当他们长大成人后走上社会时，几乎都是身怀诗画绝技。楼璩在楼氏

家族的家学学习训练中，学到了书法、绘画的基本技能，还具备了字画鉴定评价的能力。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楼璩才刚刚 9 岁，他的父亲楼异正好 37 岁，被派往河南登封任县令。楼异，酷爱自然山水与文学写作。任河南登封县令期间，“雅有文学，性爱山水”，几乎天天早出晚归，足迹踏遍了嵩山一带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大量吟咏嵩山的诗文，如《嵩山二十四峰咏并序》《嵩山三十六峰赋》等，在当时享有盛誉、人人传诵，后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刻石碑立于少林寺，碑高 233 厘米、宽 89 厘米，保存至今。^[46]由于他作诗、绘画的技艺高超，同时又是当地行政主官，体恤民情、关爱民生，还为当地百姓减免赋税，所以深得百姓拥戴。当时，像楼异这样多才多艺的县令，并不多见，于是被人誉为“诗画县令”。当“诗画县令”父亲楼异在嵩山抒情山水间的时候，年幼的儿子楼璩正在四明的学校里潜心读书，为将来自己也能“科举应仕、修身报国”作好充分准备。34 年之后 43 岁的楼璩走马上任於潜县令，并绘制了《耕织图》，终于和他的父亲楼异一样，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画县令”。

楼璩喜欢书画创作，但流传至今的书画作品几乎很少。除了绘制举世瞩目的稀世珍宝《耕织图》，楼璩还绘制了《六逸图》《四险图》等著名画作，见著于有关古籍。楼璩还喜欢广交文友，结交了一批当代名宦与书画名家，如张浚、刘岑、魏元理、徐竟等，收藏不少他们的书画作品，以及大量前代名家的名作。单就楼钥《攻媿集》所见，楼璩就收藏有钱易的《三经堂歌》，还有苏轼、钱明逸、张耒、林逋、蔡襄、钱昆、吕大临、文彦博、石曼卿等近三十人的书画名作，作为传家之宝。楼钥还在《攻媿集》中记载：“伯父扬州，持节拥麾几遍东南，襟

度高胜，所至多与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画，徐公明叔之书，皆擅名一时。桂花才一枝，谛观佳处，怀疑有秋风生其间。”^[47]可见，当时楼璩收藏的名人字画，有不少名画画技高超，唯妙唯俏，栩栩动人。

（三）一心只画农桑的县太爷

南宋时期，地方县令主官一般任期为两年，并实行本地人回避制度。宁波人楼璩在任潜任职仅有两年，却在短短的时间里，绘制完成了举世瞩目的《耕织图》。从现有资料研究发现，楼璩无非是在父辈指点下，谙熟仕途之道、了解朝廷需求、掌握时代趋势、发挥平台优势，看似率性实为用心，顺势而为地追随父亲楼异“诗画县令”脚步，当了一回“一心只画农桑”的县令，走了一条别的县令想不到、也没有走的道路。

在南宋初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楼璩绘制《耕织图》，其实是县令岗位职责的客观需要、本人诗画才情的主观能动。简单说就是职责需要、个人爱好。

首先是职责需要。从客观上来分析，楼璩无非在履行县令职责、完成“劝农使”任务，响应朝廷号召、落实上级部署，教化劝农生产、推广农桑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加强乡村治理，维持社会稳定、巩固国家政权。身居南宋朝廷副宰相高位的楼钥这样描述楼璩，“伯父时为临安於潜令，笃意民事，概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48]楼璩的孙子楼洪也说：“先大父为临安於潜令，勤于民事，咨访田父蚕妇，著为耕织二图诗。”^[49]可见楼璩是一位恪尽职守、体恤民情的地方主官，必须关注农业、发展农业。尤其是在南宋初年人口猛增的情况下，地方官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提高粮食单位产量、解决属地居民人口的粮食问题。同时，只有创造朝廷关注的政绩，才有可能获得晋升的资本；只有创造出色的政绩，和别的县令“不一样”，才有可能获取进见皇帝

的机会。

其次是个人的爱好。从主观上来分析，楼璩是一个有情怀抱负、才华技艺的县令，自幼生活在耕织发达的鄞江平原，对耕织文化有着天然感情，同时深受父亲楼异“诗画县令”言传身教和韩滉《田家风俗图》诗画合一表现农耕生活的影响^[50]，自己当了县令后终于拥有实现自己愿望、发挥自己特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自己决策的平台。楼璩与他的父亲楼异一样，展现出“书画县令”的多才多艺，创造性地运用诗画合一的艺术表达方式，描绘了於潜地区耕织生产生活场景画卷，并在思想内容方面更上了一层楼：一个是纵情自然山水吟诵山水风光之美，一个是纵情稻田桑林记录耕织劳作之苦；一个是审美情绪的发挥，一个是忧国忧民的感叹；一个是自我陶醉，一个是劝课农桑。当然，楼璩绘制的《耕织图》，在韩滉《田家风俗图》的基础上更趋完整、系统、全面。

客观责任加主观能动，让这位 43 岁的县令满怀激情、如鱼得水，在於潜这块并不太大的土地上，发挥独到绘画技能，施展抱负和才华，干出了其他县令无法比拟的政绩。这一政绩，既符合朝廷的政策导向，又符合社会需求，还夯实从政基础，更留下珍贵资料，可谓是“一举多得”。

综上所述，由于北宋末年与南宋初年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带来了特定的历史需求、环境氛围、人才配备，使一个并不最具耕织文化典型的江南山区小县，具备了符合“天时”、占据“地利”、拥有“人和”的耕织文化发展内在动力和外部优势。于是乎，集中国古代耕织图像大成者、“世界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南宋楼璩《耕织图》就在於潜顺其天然、应运而生了。

参考文献:

- [1] 王潮生. 中国古代耕织图概论 [M]. 北京: 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 5—6.
- [2] 臧军. 楼璩耕织图与耕织技术发展. 中国农史 [J]. 1992, (4): 77—86.
- [3] [宋] 楼洪. 耕织图诗·跋 [M]. 知不足丛书 (第九卷).
- [4] 臧军. 楼璩耕织图与耕织技术发展. 中国农史 [J]. 1992, (4): 77—86.
- [5] 朱启臻. 首届临安耕织文化论坛主旨发言报告 [R]. 浙江, 2023. 10.
- [6] [清] 袁牧. 重修钱武肃王庙记 [M]. 小仓山房外集 (卷八).
- [7] [清] 李调元. 全五代诗 [M]. (卷四十七).
- [8] 葛剑雄. 吴越国对“人间天堂”建设的贡献. 第四届吴越文化论坛主旨发言报告 [R]. 浙江, 2022. 5.
- [9] 钱文选. 钱氏家乘 (卷五)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25—30.
- [10] 倪士毅, 方金如. 论钱镠. 杭州大学学报 [J]. 1981, (9): 54—63.
- [11]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二六七) 后梁纪 [M].
- [12] [清] 纪昀等编撰. 钦定四库全书·吴越备史 (卷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影印本.
- [13] [元] 脱脱, 阿鲁图等编撰. 宋史 [M]. 卷四百八十, 吴越钱氏.
- [14] [宋] 苏东坡. 苏东坡全集 (卷三三) 表忠观碑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 [15] 郭琳. 纳土归宋的大智慧. 社会科学报 [N]. 2022—9—8; (8).
- [16]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17] 邹逸麟.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18] 葛剑雄. 宋代人口新证. 历史研究 [J]. 1993 (6): 34—45.
- [19] 漆侠. 宋代经济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20] 吴廷燮. 北宋制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1] 林正秋. 京师聚四民人口冠全国 [A] // 周峰主编. 南宋京城杭州 [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76.
- [22] 浙江省通志编委会. 浙江通志·蚕桑丝绸专志 [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374—375.
- [23] 包伟民, 吴铮强. 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1): 38—47.
- [24] 康华. 从劝农文管窥宋代乡村经济社会 [J]. 农业考古, 2014, (6): 295—298.
- [25] 邢春生. 宰相画家韩滉与他的农村题材绘画创作 [J]. 兰台世界, 2015, (2): 96—97.
- [26] 宁业高, 桑传贤. 中国历代农业诗歌选 [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8. 60—300.
- [27] [宋] 李心传撰, 辛更儒点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33—320.
- [28] 蔡涉主编, 臧军主编助理. 临安县志 [M] 自然环境编第五章水系.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 59—60.
- [29] 蔡涉主编, 臧军主编助理. 临安县志 [M] 自然环境编第六章土壤.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 64—65.
- [30] [清] 光绪二十四年. 於潜县志 (影印本) [M]. 2019.
- [31] 蔡涉主编, 臧军主编助理. 临安县志 [M] 政区编第一章建置沿革.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 02—03.
- [32] [清] 光绪二十四年. 於潜县志 (影印本) [M]. 2019.
- [33] 凌亦鹏主编. 临安年鉴 2022 [M]. 河南: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22. 347—356.
- [34] 朱新予. 浙江丝绸史 [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24—26.
- [35] [日] 渡部武, 曹幸穗. 耕织图流传考 [J]. 农业考古, 1989, (1): 160—166.

- [36] 〔清〕阮元. 两浙金石志 [M].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 [37] 〔清〕康熙十二年. 於潜县志 [M]. (财赋志).
- [38] 蔡涉主编, 臧军主编助理. 临安县志 [M]. 大事记.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 01—03.
- [39] 江跃良主编. 临安历代诗词汇编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9. 147—148.
- [40] 王国平. 以杭州为例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浙江学刊 [J]. 2008, (4): 95—106.
- [41] 蔡涉主编, 臧军主编助理. 临安县志 [M]. 交通编第二章航道.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 301—312.
- [42] 〔清〕鄞塘楼璩宗谱 [M]. 七修本·卷三. 追远行传.
- [43] 〔宋〕李心传撰, 辛更儒点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M]. 卷 66.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852—853.
- [44] 唐燮军, 邢莹莹. 科举社会中四明楼氏的盛衰 [J]. 宁波大学学报, 2016, (3): 43—48.
- [45] 郑传杰, 郑昕. 楼氏家族 [M]. 浙江: 宁波出版社, 2012. 136—180.
- [46] 唐燮军, 孙旭红. 两宋四明楼氏的盛衰沉浮及其家族文化——基于《楼钥集》的考察 [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92—193.
- [47] 〔宋〕楼钥. 楼钥集 [M].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362—365.
- [48] 〔宋〕楼钥. 玫瑰集 [M]. 卷七十六跋扬州伯父耕织图. 影印本.
- [49] 〔宋〕楼洪. 耕织图诗跋 [M]. 知不足丛书 (第九集). 影印本.
- [50] 刘兴珍, 李嵩《服田图》考 [A] // 美术史论丛刊 (2)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2. 107—108.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Birth of *The Painting of Farming and Weaving in Yuqian*

Zang 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Zhejiang A&F University, Lin'an, Zhejiang 311300)

Abstract: Qian Liu of the State of Wu and Yue established the prosperous “granary of the world” in Jiangnan, where “ Suzhou and Hangzhou are ripe, and the world is full of food” . The three large-scale southward migrations of the northern popul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pital of the Song Dynasty in Hangzhou promoted the southward movement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enter. The sharp increase in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rought social pressure and urgently needed innovation 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The natural and superior environment of Yuqian in the suburbs of the Capital city became a fertile land for rice and sericulture, and the “Poetry and Painting County Magistrate” Lou Shu was passionate about farming and weaving, and actively took on the role of a painter who records Yu Qian’s agricultural and mulberry production. These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such as favorable timing,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uman harmony,

(下转第 19 页)

come a hobby and entertainment of the royal nobility. However, in northern ethnic minority areas, raising eagles is still highly valued, an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ople rely on it for a living.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imal husbandry history, and takes ancient eagle family rapto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Chinese eagle farming, the progress of eagle farming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eagle farming methods.

Key words: History of raising eagles, Eagle rearing method, Animal Husbandry History

[作者简介] 岳洋 (1999—), 男,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硕士, 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史; 李群 (1960—), 男,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畜牧兽医史。

(上接第 60 页)

which are unique, timely, and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erson, constitute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birth of *The Painting of Farming and Weaving* in Yurqian.

Key words: *The Painting of Farming and Weaving*, Birth, Background

[作者简介] 臧军 (1962—), 男,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地方志、农耕文化、民俗文化。

(上接第 127 页)

Abstract: As an agronomi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Gao Runsheng first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ancient agronomy” and combining ancient agronomy with Western disciplines. As the first scholar to put forward “ancient agronom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made a contribution in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e. However, there is only a small amount of data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and small amount of historical archives of Gao Runsheng, and the research on him and his books is not that perfec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Gao Runsheng's only book *Erya Gu Ming Kao*, combined with relevant abstracts included in the *Continuation of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to check Gao Runsheng's academic track of agronomy, in order to explore his early ancient agronomy thought of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griculture, and to show Gao Runsheng's truth-seeking academic spirit and open and inclusiv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oncept.

Key words: Gao Runsheng, *Erya Gu Ming Kao*, Ancient agronomy, Format and content

[作者简介] 于欣蕾 (2000—), 女,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古文、汉语史。